

我国经济增长中供给侧与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效应研究

李福柱,田 爽

(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判断全国及各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态势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战略决策价值。基于 2001—2017 年全国 30 个省份面板数据样本,运用门槛模型分别从供给侧与需求侧探讨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由外需拉动向在内需扩大基础上消费升级拉动的转换效应。结果表明:沿海地区及全国样本总体上已表现出显著的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态势,但尚未完成其转换目标,内陆地区没有表现出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态势。全国及沿海与内陆地区均已成功实现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消费升级成为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沿海地区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完成情况优于内陆地区,全国及各地区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的完成情况均明显滞后于其需求侧。

关键词: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增长;供给侧;需求侧;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6-0081-16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6.011

The Conversion Effect from the Old Kinetic Energy to the New One between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i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LI Fu-zhu, TIAN Shuang

(School of Economic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100, China)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value to judge the conversion trend from the old kinetic energy to the new one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even in the region in promoting China's high quality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samples of 30 provinces from 2001 to 2017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respectively, the conversion effect has been discussed in terms of from the factor-driven to the innovation-driven and from the external demand pull to the consumption upgrade based on the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applying the threshold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astal areas and their national samples have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conversion trend from the old kinetic energy to the new one on the supply side in the mass, but their conversion objectives have not yet been completed, while the inland areas still do not show the same conversion trend on the supply side. The whole country even the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have successfully achieved the conversion goal from the old kinetic energy to the new one on the demand side, and the consumption upgrad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demand-side economic growth. The completion of conversion targets on the supply side in coastal areas is better than that in inland areas, and it lags behind its demand side in the whole country even in the sub-regions.

Key words: conversion from the old kinetic energy to the new one; economic growth; supply side; demand side; threshold effect

收稿日期:2020-08-26

作者简介:李福柱(1968—),男,山东青岛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田 爽(1994—),女,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已成为我国推动经济领域改革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以及大规模出口等。而当经济总量和规模增长到一定程度后,以人口数量红利、资本要素投入和国际贸易为主的原有经济增长动力就不再能够满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1]。为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形成能够适应中国要素禀赋结构与经济环境变化的新动力机制,这个动力机制的供给侧是由创新引领,需求侧则是人民的向往^[2],在高质量发展目标约束下,经济增长是实现高质量的生产总值提高,因此,亟需培育并激发源于创新与拥有巨大国内市场规模的居民消费需求的新动能,逐步改造升级传统动能,以减少落后动能对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率的阻碍,逐渐转向主要依靠新动能驱动或拉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围绕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探讨,相关文献主要侧重于两种研究思路:一是从供给侧视角考察。陶长琪等学者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制度质量视角探究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的内在路径^[3];王一鸣认为改革创新可以培育新动力,通过重塑新的体制机制能够释放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4]。二是从需求侧视角考察。新常态下外需拉动力趋于疲软,内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5];也有学者认为内需拉动力主要由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上升带来的消费升级发挥了作用^[6];陈冲等学者指出,消费结构升级对总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对高质量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当跨过门槛值后,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效应将更加凸显^[7]。而李建伟则从供给侧与需求侧两个视角综合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过程,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经历了由劳动力要素驱动、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共同驱动、资本要素驱动向资本要素和自主创新的协同驱动转变,而建国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也经历了从内需拉动向内外需共同拉动,转而进入如今的内需拉动为主的新阶段^[8]。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多数研究仅从单一侧探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动力转换,但经济增长既依靠供给侧驱动力,也依赖需求侧拉动力,两者共同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培育高水平供需关系的新兴市场是新旧动能转换的经济理论逻辑与内涵^[9],虽有少数学者从供给侧与需求侧探讨了建国后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过程,但缺乏供给侧与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对经济增长水平变化的作用机理分析及实证检验。本文从供给侧与需求侧视角,综合考察新旧动能转换对经济增长水平变化的作用机理,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别探讨供给侧与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是否完成及其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效力变化,重点分析新旧动能转换目标完成情况的空间差异以及供给侧与需求侧差异,以期可以为政府判断新旧动能态势与进展提供理论支撑。

一、理论分析

(一)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将驱动我国经济由粗放型高速增长转向集约型高质量增长

第一,供给侧旧动能驱动以往我国经济粗放型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依赖于大规模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解决了生产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并形成了推动以往我国经济粗放型高速增长的要驱动。首先,农业剩余劳动力及新增适龄劳动力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人口数量红利,这可以直接增加就业供给和产出,加速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化发展,而且,劳动力要素流向生产效率相对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既能依托劳动力投入促进资本形成和积累,还能通过产业间效率差异带来产出差额,这为经济增长贡献“增长效应”,以及通过聚集效应和干中学效应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还为经济增长带来“效率效

应”^[10]。同时,大量劳动力投入能够通过低成本劳动力要素扩大本国产品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出口并吸引外资流入而间接地驱动经济增长。其次,具有相对较高投入产出效率的资本要素由于其高资本形成率和大规模投资使经济总量和规模在短期内大幅攀升^[1]。在资本要素相对稀缺的经济发展初期,大规模工业化扩张、民生工程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等吸引高投资的举措,以及由大量人口支持与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引发的高储蓄,致使资本要素在此过程中不断积累并主导以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最后,自然资源禀赋对我国尤其是资源丰富的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而且,还能通过增加物质资本及提高科技创新水平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间接效应^[11]。

单纯依靠大量生产要素投入必然会带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其未来的经济增长会受到规模报酬递减的约束^[12],生产要素边际产出效率降低以及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引致要素驱动我国经济总量和规模扩张逐渐乏力。由于现阶段我国经济面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老年抚养比提高与工资上涨导致以往的人口数量红利消失,以及资本积累增速减缓和资源环境规制硬约束,降低了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效率。因此,高度依赖于要素驱动经济粗放增长的方式使我国陷入经济增速放缓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两难困境”,这种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为目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逐渐难以为继。

第二,源于创新的供给侧新动能将驱动我国经济转向集约型高质量增长。随着要素驱动力日渐衰减,供给侧的核心动能必须逐渐依赖于由基础性知识创新带来的颠覆性与渗透性技术创新并结合制度创新的稳步集成。由于知识的外溢性和高流动性,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与国际前沿的差距相对较小,可以通过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研究实现技术创新,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市场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或科

研机构,以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引领技术赶超,还能够通过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生产过程并提高其转换效率,有效催生具备核心知识技术的强竞争力新产业。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整合无形生产要素与有形生产要素,通过一系列应用创新活动推动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交互融合与协同发展,改革传统产业或企业原有生产模式并创造出新兴业态,培育适合我国当前要素禀赋结构和经济社会环境的供给侧新的经济增长点。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形成与发展不仅需要知识和技术创新,更需要制度创新,以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新动能发展以及健全与完善制度结构,并形成优化资源配置和激励技术创新的环境^[13]。

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在当前以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时代层出不穷,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供给侧新引擎^[1]。新技术能够适应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促进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实现产业的前沿技术进步及供给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有利于提升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生产效率,提高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与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加速攀升至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新产业可以将新技术转化为高效的现实生产力,因为科技知识的产业化既能创造出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等,还能优化生产方式组合以突破长期稳态均衡,使生产前沿面外移进而迈向更高水平的稳态均衡,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生“增长效应”^[14]。新产业由于其相对较高的生产效率可以进一步吸引高级生产要素流入,以实现新产出增长,这既能够扩大新产业生产规模,还能够依托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关联程度较高的其他产业发展,进而加速延伸产业链条并引领产业升级,而且,新产出能满足消费者对高端消费与新兴消费的需求,在提高经济体生产效率的同时,也能满足居民对高质量生活水平的追求。

新技术、新产业固然重要,但技术领先并不

意味着市场领先,为使科技创新更大力度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应重视把新技术、新产品和与之匹配的商业模式有机结合,形成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15]。通过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既能降低设计、生产、销售、流通及服务等环节的交易成本,以提高生产效率,还能够产生规模递增的效果^[16]。新商业或服务业模式既有利于支撑新兴产业发展,还能改变传统产业或企业的生产或经营模式,以改造升级传统动能,推动产业或企业提质增效,激发我国经济增长活力。新业态有机整合了社会闲置、碎片化的资源,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形成了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新兴服务或经营业态,畅通了市场信息,降低了生产成本,有助于扩大创新型企业的市场规模和利润以及满足消费者多层次的消费需求。

第三,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及其动态演进。在人口数量红利消失、资本报酬递减以及资源逐渐枯竭的经济环境下,若继续高度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甚至是提高资本劳动比来推动经济增长都是难以持续的,必须转移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与技术进步有关的生产率基础方面^[17],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与服务供给的附加值、技术含量以及产业价值链与整体经济竞争力,进而提升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率。已有文献表明:老年人口比和投资率较高的经济体易遭受中等收入陷阱,而中高等教育人口占比和高科技出口产品占比相对较高的国家很少经历经济增长减缓^[18]。因此,为减缓我国经

济增速下滑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必须将以往的高度依赖于生产要素投入的要素驱动力逐渐转变为创新驱动。

由要素驱动力向创新驱动转换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可能会经历要素驱动为主、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及创新驱动为主三个阶段。首先,在原有经济增长路径中要素驱动力占据主导地位,创新驱动还处于培育期,这同样可能是我国当前陷入“资源诅咒”,部分省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症结所在。其次,要素驱动力由于要素规模报酬递减及资源环境约束呈下降趋势;相反,高素质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等优质资源流向生产效率相对更高的创新型产业部门,从而使创新驱动强劲增长,此过渡阶段可以部分抵减或抵消因要素驱动乏力导致的我国经济增速缓慢下滑。最后,当创新驱动持续提高直至超过要素驱动力,成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主要动力时,可以通过源于创新的“四新”动能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新产出及其产出增长以及推动传统产业或企业提质增效,进而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新旧动能转换不是一蹴而就的,以知识、技术和制度创新为核心的新动能仍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现阶段仍要保持好要素驱动环节和领域中的比较优势^[19],即我国经济要实现集约型高质量增长,仍需发挥要素对经济总量和规模缓慢扩张的驱动作用,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要素、产品与服务质量,同时更需要借助创新改进要素生产效率,提高供给质量,大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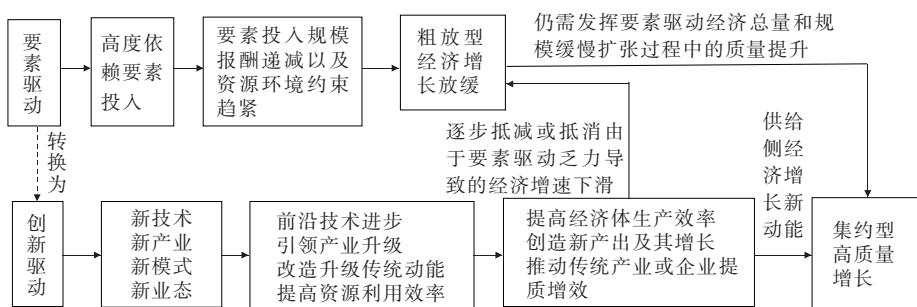


图 1 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将驱动我国经济由粗放型高速增长转向集约型高质量增长

(二)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拉动我国经济由外需主导型高速增长转向内外需协调型高质量增长

第一,需求侧旧动能拉动以往我国经济外需主导型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大规模出口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相对较低的消费需求造成的内需拉动力不足,并基于比较优势与后发国家优势拉动以往我国经济外需主导型高速增长。首先,我国出口产品基于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市场并参与全球分工,这既能解决我国部分产出相对过剩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直接增加我国国民财富收入,还可以吸引现有资源从生产效率低的非出口企业转移到生产效率高的出口企业^[20],可以形成并扩大其规模经济,提高我国出口专业化水平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出口企业为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以低廉的价格优势获取并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而不断进行产品或工艺创新,提高自身生产率和收入份额^[21],即比较优势能够通过刺激出口竞争间接地拉动经济增长。其次,出口可以吸引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利于我国充分发挥后发国家优势。通过有机整合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资金等优势及我国资源禀赋丰裕优势,促进我国产业或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缩减我国模仿创新成本,并补充我国经济发展初期所需资金。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不振。发达国家对我国低中端产品的需求趋于饱和,发展中国家对我国产品的需求短期内难以快速大规模增长,加上开拓发展中国家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市场会受到少数国家借由政治等因素加以干扰,引致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需求的外需引擎作用逐渐减小。此外,由于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供给趋紧,虽然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缩小,但面临着国际经济持续

低迷环境下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对我国企业造成的双重挤压^[22],出口产品市场进一步缩减,拖累了我国外部需求增长的继发性动力。

第二,在内需规模扩大基础上消费升级的需求侧新动能拉动我国经济内外需协调型高质量增长。随着我国外需引擎作用逐渐减小,需求侧新动能的形成逐渐源于在内需规模扩大基础上的消费升级。不断提升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逐渐形成的巨大国内需求市场引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共同构成的内需规模逐步扩大,但是,由于支持高储蓄的人口红利消失,投资需求拉动生产已出现产能过剩等现象,投资需求拉动空间趋紧^[23],而以居民国内消费为主体的消费需求稳定上升。近十年来,零售业商品进口额占零售业商品总销售额的比重仅为2.3%;政府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支出的比重约为26.8%,这表明消费需求中境外消费占比与政府消费占比均较低,居民在国内的消费需求是当前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①在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持续稳定上升的基础上,消费品质升级、消费结构优化以及消费模式创新等消费热点的涌现,为我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创造出需求侧新的经济增长点。

消费品质升级主要指消费者对原有产品及服务性能在质量提升方面的需求以及对新兴产品和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即由对低端产品与服务消费需求转变为对中高端产品和服务消费需求。中高端消费具有相对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能够吸引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不断地进行产品、工艺和流程创新,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与市场竞争力。同时,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巨大市场需求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进入,拉动高成长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并拓展其发展空间,以及能够促进与中高端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相关联的上下游产业发展,提高我国整体经济效率;此外,经济效率的提升有利于增加居民人均收入,进一步拉动中高端消费,而且新兴消费品有助于突

破消费者原有的消费约束边界,提高消费者总效用水平。

消费结构升级表现为居民消费支出中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下降,发展型与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上升。消费者对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需求的增长意味着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由第一产业的产品和服务逐渐转向第二、三产业的产品和服务,以此可以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同时,消费结构升级还能刺激资源从传统产业流向现代服务业,为新兴产业和新兴产品的发展提供强劲的需求拉动力,使供给结构不断适应需求变化^[7],尤其能够引导三次产业中的投资流向消费需求更旺盛的中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将发展型与享受型消费需求转化为能够被消费者需求消化的现实产出,并减少与生存型消费相关产业的过剩产出。并且,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可以增加国民财富,进一步扩大新型消费需求。

消费模式升级主要是指消费者的消费方式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传统消费模式基础上创造出信息消费、数字消费等新兴消费模式。一方面,新兴消费模式既能拉动传统产业尤其是服务业转变经营或服务模式,也能依托网络服务使其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长尾效应更加显著^[24],并且,高度依赖于信息技术的新消费模式可以挤出部分过度依赖资源的消费品行业。另一方面,新兴消费模式通过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产生的体验经济、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等消费业态,能够整合优化全社会资源使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以及能够削弱消费者与厂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畅通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沟通渠道,更加便捷、低成本地解决并扩大消费者的新兴消费需求。

第三,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疲软与中国市场地位提升,经济增长引擎由外需转向内需,且内需的主拉动力由投资需求转向消费需求^[25]。在此基础上,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重点消费群体的转变以及新消费模式的出现,促

进了消费升级拉动力稳定上升,逐渐成为需求侧拉动经济内外需协调型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动力。因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人口基数较大的低收入人群迈进中等收入阶层,从而拉动整体消费能力提高。同时,随着重点消费群体及其消费偏好转变,社会消费文化出现相应变化,进而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结构。消费主体逐渐转变为新一代青年,其储蓄意愿较低且消费观念超前,消费偏好更倾向于生活质量提升和自身精神享受;可支配收入较高的中老年人对医疗养老、旅游休闲等服务性需求增加,促使社会出现新的消费文化。此外,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新兴消费文化的有机结合推动了新的消费模式产生,有助于拓展消费者的消费选择范围,以使消费者便捷地追求更高端、更高层次的产品与服务。

由外需拉动力向在内需规模扩大基础上消费升级拉动力转变同样会经历长期持续的动态调整。首先,外需拉动力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中发挥主引擎作用,同时,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状况引致投资需求拉动力相对较高,消费需求拉动力不足,但是投资需求拉动力大部分源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其次,随着外需引擎作用减小,投资需求拉动空间收窄,在消费需求稳步上升的基础上,消费升级拉动力持续稳定上升,此过渡阶段可以逐渐抵减或抵消源于外需疲软导致的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再次,消费升级上升为主要动力,拉动我国经济内外需协调型高质量增长。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下,外需拉动力仍需发挥作用但将不是主引擎作用,同时,通过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参与中高端国际市场份额竞争,能够加速将外需比较优势转变为国家竞争优势。最后,基于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消费品质升级、消费结构优化与新兴消费模式培育经济增长需求侧新动能,能够更好地拉动我国经济内外需协调型高质量增长(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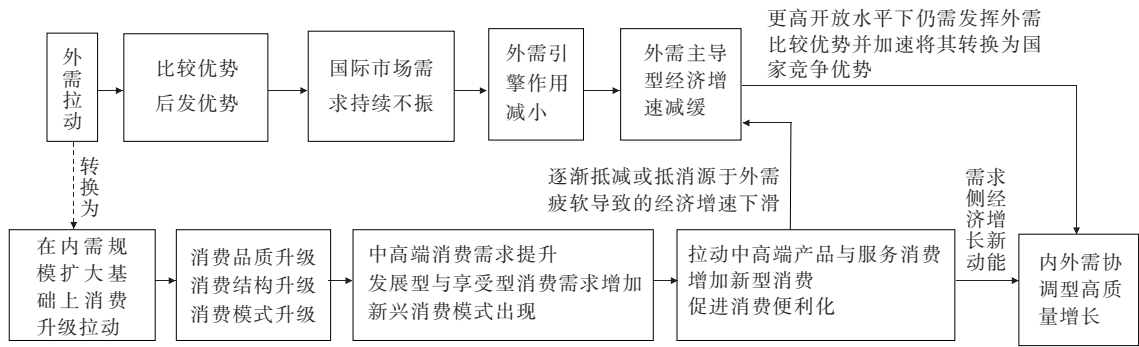


图2 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拉动我国经济由外需主导型高速增长转向内外需协调型高质量增长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从供给侧视角来看,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及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动力一旦突破技术或制度创新壁垒,创新驱动动力将会大幅度提升。从需求侧视角来看,消费品质升级、消费结构优化与消费模式创新可能会影响消费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发生变动。因此,借鉴 Hansen 的面板门槛模型^[26],选取 2001—2017 年我国 30 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供给侧单门槛模型:

$$\ln grp_{it} = (\beta_0 \ln inno_{it} + \beta_1 \ln l_{it} + \beta_2 \ln k_{it})I(\ln inno_{it} \leq \gamma) + (\beta'_0 \ln inno_{it} + \beta'_1 \ln l_{it} + \beta'_2 \ln k_{it})I(\ln inno_{it} > \gamma) + \rho_1 \ln inu_{it} + \rho_2 \ln finan_{it} + \rho_3 \ln tran_{it} + \rho_4 \ln gov_{it} + \rho_5 \ln inst_{it}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需求侧单门槛模型:

$$\ln grp_{it} = (\alpha_0 \ln con_{it} + \alpha_1 \ln ex_{it} + \alpha_2 \ln i_{it})I(\ln con_{it} \leq \theta) + (\alpha'_0 \ln con_{it} + \alpha'_1 \ln ex_{it} + \alpha'_2 \ln i_{it})I(\ln con_{it} > \theta) + \mu_1 \ln inu_{it} + \mu_2 \ln finan_{it} + \mu_3 \ln tran_{it} + \mu_4 \ln gov_{it} + \mu_5 \ln inst_{it}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I(\cdot)$ 表示指示函数,取值为 0 或 1; i 表示地区; t 表示时间; γ, θ 分别表示创新驱动动力、消费升级拉动力门槛值; u_i 为个体固定效应; ε_{it} 为残差项。 grp 为地区生产总值; $inno$ 为创新驱动动力,是供给侧门槛变量,也是其解释变量之一,其余两个解释变量为劳动力

规模 l 和资本存量 k ; con 为消费升级拉动力,是需求侧门槛变量及其解释变量之一,其余两个解释变量为投资需求 i 和代表外需拉动力的出口规模 ex ; 为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尽可能控制相关影响因素,选取产业结构水平 inu , 金融发展水平 $finan$, 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tran$, 政府支持力度 gov 和制度质量 $inst$ 为控制变量。为减弱数据的异方差现象,获得相对平稳的面板数据,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

一旦确定存在单门槛值,需要继续检验是否存在多门槛值,以此类推,本文不再赘述。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选择适宜的经济增长度量指标是本文实证检验中的重点,因为受数据可获得性限制,无法获取度量过去高速增长与近年来国家要求实现的高质量增长的统计口径一致的单一变量数据,构建指标体系进而折算出最终单一变量指标也会受到指标间存在关联性问题的困扰,所以,本文以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要求为前提,假设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也会存在增长质量的变化。度量经济增长中的新旧动能转换效应,既包括旧动能对经济增长水平变化的影响,也包括新动能如何促进经济转向高质量增长。因此,合意的经济增长指标需要重点测算出供给侧与需求侧新旧动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力变化程度。由于要素驱动力与外需拉动力在以往促进我国经济粗放型高速增长时,突出表现为我国经济总量和规模呈现大幅度扩

张,而且,随着要素驱动乏力与外需拉动疲软,我国经济总量和规模趋于缓慢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我国正经历新动能可能促进经济总量和规模缓慢扩张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渐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增长中保持相对稳定不变的是经济总量和规模的增长趋势,因此,实际地区生产总值(总量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整体度量新旧动能转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过程,且对各经济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后,可以反映变量之间(近似于复合)增长率的关系,基于此,本文选取各省份用 GDP 指数折算成以 2001 年为基期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grp)为代理变量(亿元)。

2. 供给侧解释变量

一是创新驱动动力。有关研究对创新驱动动力的衡量多从创新投入视角,选用研发人员投入、研发资金投入作为度量指标;或从创新产出视角,以专利申请受理量、专利申请授权量为代理变量。创新产出相比于创新投入更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真实创新水平,Hasan&Tucci 认为,拥有更高专利水平的国家往往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若一个国家提高专利数量和质量,经济增长也会随之上升^[27],表明专利数量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驱动动力。由于专利申请授权量剔除了未申请成功的专利数量,本文选取各省份专利申请授权量衡量创新驱动动力($inno$)(件)。

二是劳动力规模。衡量劳动力要素应兼顾数量和质量。大多数学者认为,从劳动力质量视角以人力资本水平为代理变量可以更好地衡量劳动力要素,但其衡量指标尚未统一,而且人力资本水平随着教育的普及逐渐提高,高素质劳动力为提高创造力带来更大可能,人力资本水平与创新驱动力之间具有无法具体度量的联系,在实证分析中可能会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从劳动力数量视角可以用人口数量、年末就业人数等指标衡量。其中,人口数量包括了无劳动能力的人口;年末就业人数主要是用

以反映劳动力要素粗放式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不仅能反映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低素质劳动力投入规模,而且便于衡量劳动力要素驱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乏力程度。因此,选用劳动力数量指标,以各省份年末就业人数衡量劳动力规模(l)(万人)。

三是资本存量。借鉴张军的核算方法,根据永续盘存法估测各省份资本存量(k),具体计算公式: $K_{it} = K_{it-1}(1 - \delta_{it}) + I_{it}$,以各省份 2001 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 10% 作为初始资本存量 K_0 ,折旧率 δ 为 9.6%, I_{it} 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为以 2001 年为基期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亿元)^[28]。

3. 需求侧解释变量

一是消费升级拉动力。由于生存型与享受型消费需求增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高端消费规模的扩大以及新兴消费模式的出现,且消费品质升级与消费模式升级的衡量指标难以量化,因此,本文在实证分析部分以消费结构升级代表消费升级拉动力,考虑将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指标,以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中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占比计算城乡恩格尔系数,并分别以城乡人口比对城乡恩格尔系数赋值,计算总体恩格尔系数。为使实证分析表现出显著性特征,选用各省份恩格尔系数倒数衡量消费升级拉动力(con)。

二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预期投资需求增加可以刺激和扩大生产,由于衡量预期投资需求的数据缺失,以及预期投资需求增加将促进实际投资需求的增长,本文以实际投资需求(i)代表预期投资需求,选取各省份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为不变价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衡量(亿元)。

三是出口规模。为衡量以出口代表的外需拉动力变化,本文从出口规模视角分析出口额增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选取各省份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出口额,并用 GDP 平减指数折算成以 2001 年为基期的实际值作

为出口规模(ex)衡量指标(亿元)。

4. 控制变量

一是产业结构水平。基于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产业生产率水平的差异,可以吸引生产率相对较低的部门的生产要素流入高生产率部门,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提高整体生产率,但是,产业结构变迁也有可能引起技术替代,对特定产业部门造成冲击并引起生产要素供给的变动,造成经济波动^[29]。本文借鉴大多数文献以各省份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度量产业结构水平(inu)。

二是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如何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取决于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金融发展水平可以通过优化资本配置效率和分散风险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若金融发展水平低将可能由于投资渠道少、资金闲置等问题而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甚至是倒退。本文借鉴杨有才以各省各项贷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金融发展水平($finan$)^[30]。

三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可以通过带动相关物资和服务市场的需求,降低企业成本、提高运行效率,以及通过增强区位优势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31]。本文借鉴刘生龙等学者选用交通基础设施密度衡量各省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tran$),以铁路、公路和内河航道里程三者之和与其国土面积之比,测算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程度^[32]。

四是政府支持力度。为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可以通过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手段直接干预经济,但政府干预不当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政府支出往往集中在公共产品领域,一方面能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刺激居民消费,但同时高税收也会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本文以各省份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政府支持力度(gov),其系数数值可能为正或负。

五是制度质量。制度质量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因素,今后我国经济长期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内生技术进步和制度质量提升释放的“制度红利”^[33]。制度质量的提升可以激发创新主体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有利于创造出更高品质、更高层次的产品和服务及与其相适应的新兴消费模式,并为创新驱动与消费升级拉动力力的提高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本文参考陈冲等学者的衡量方法,选取各省份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企业的比重表示制度质量($inst$)^[7]。

本文选用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各个指标对应的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及Wind数据库。其中,《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8》未发布,以各省份统计年鉴相同统计口径下相关数据补齐。

三、实证分析

沿海地区集聚众多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储备丰裕的科研院所、双一流高校和创新型企业,是创新引领之地,而且,技术创新能够降低产品生产和服务成本,进一步提升消费能力较高与消费观念超前的沿海地区居民对消费升级的需求。相反,内陆地区更注重依靠资源要素优势发展传统产业,而创新型产业发展相对薄弱,其消费升级拉动力的形成及提升也受限于其偏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因此,本文以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为空间分析框架,探究全国不同区域供给侧与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完成情况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变化。^②

(一)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效应实证分析

首先,根据Hansen提出的Bootstrap方法模拟LM检验 F 统计量的渐进分布,通过反复抽样500次得到 P 值,检验创新驱动是否存在门槛效应^[26]。沿海地区和全国样本创新驱动动力均存在已突破的单一门槛值,分别为7.6653,9.7464,置信区间分别为(7.6309, 7.8260)与(9.6858, 9.7840),而内陆地区创新驱动动力不存在门槛值,即不存在门槛效应(如表1所示)。

其次,检验门槛估计值与真实值是否具有—致性, Hansen 提出,构造统计量 $LR(\gamma) = (S_0(\gamma) - S_1(\gamma)) / \sigma_2$, 当 $LR(\gamma) \leq -2\ln(1 - \sqrt{1 - \alpha})$ 时,门槛估计值真实有效,即当 $\alpha =$

5%时,临界值为 7.350 0^[26]。根据似然比函数图,门槛估计值对应的 LR 统计量小于临界值 7.350 0,即在 5%的置信水平下,门槛估计值通过了真实性检验(如图 3 所示)。

表 1 供给侧门槛效应检验及门槛值估计

地区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全国	
门槛检验	单门槛检验	双门槛检验	单门槛检验	单门槛检验	双门槛检验
F 统计量	38.580 0	8.230 0	26.640 0	58.810 0	39.270 0
P 值	0.076 0	0.502 0	0.540 0	0.000 0	0.164 0
门槛值	7.665 3	—	—	9.746 4	—
置信区间	(7.630 9, 7.826 0)	—	—	(9.685 8, 9.784 0)	—

注: bootstrap 方法反复抽样 500 次得到 P 值;“—”表示此项为空(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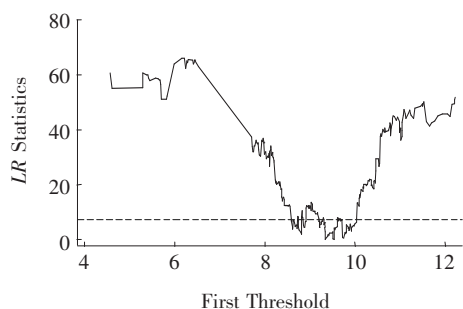


图 3 30 个样本省份创新驱动力的门槛估计值与置信区间

沿海地区及其引领全国样本在总体上表现出显著的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态势,但尚未完成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而内陆地区仍没有表现出新旧动能转换态势,现阶段我国各地区及全国总体上仍需生产要素发挥其主要驱动作用,在经济总量和规模缓慢扩张的过程中,创新水平不断提高,将促进我国经济逐渐转向集约型高质量增长(如表 2 所示)。

第一,沿海地区创新驱动动力低于门槛值之前,劳动力、资本要素驱动力的弹性系数值分别为 0.946 0 和 0.296 9,创新驱动动力的弹性系数值仅为 0.072 8,且不显著,这表明此时创新驱动动力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并不明显,主要由要素驱动力发挥作用。在创新驱动动力突破门槛值之后,劳动力要素驱动力弹性系数值降至 0.683 3,资本要素驱动力式微上升至

0.382 9,说明资本要素一直是驱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之一,而创新驱动动力弹性系数值跃升为 0.203 2,其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提高了近三倍。从各变量的影响效力变化上来看,劳动力、资本要素驱动力的总和贡献水平有所下降,创新驱动效应显著提升,但是,在突破门槛之后,创新驱动动力弹性系数值分别仅为劳动力、资本要素驱动力弹性系数值的约 0.3 倍、约 0.5 倍,创新驱动动力仍小于要素驱动力,这表明沿海地区虽表现出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态势,却尚未完成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仍主要依赖要素驱动该地区经济增长。这可能因为沿海地区是我国自主创新领先地区,其创新投入成本与创新成果共享门槛均高,存在创新型产业尚未形成规模经济以及科技成果转换效率较低等仍未解决的关键问题。

第二,内陆地区创新驱动动力不存在门槛效应,这表明内陆地区尚未表现出显著的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态势。本文进一步选用 OLS 模型对内陆地区样本进行检验并予以简单参考(估计结果不成为本文研究结论的主要依据),估计结果表明内陆地区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驱动力,其弹性系数值分别为 0.151 2, 0.531 3,而创新驱动动力尚在培育期,其弹性系数值仅为 0.154 4,尚未超过劳动力、资本要素对其地区生产总值的总和贡献水平(如

表 2 所示)。这可能是因为内陆地区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丰富致使该地区发展传统产业具有低成本高产出的显著优势,以及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经济总量和规模扩张的短视行为,引致

该地区一直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发展第二产业,直至要素驱动力呈现乏力才重视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与改进制度创新环境,导致内陆地区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接续不连贯。

表 2 供给侧各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门槛回归		变量	OLS 回归 内陆地区
	沿海地区	全国		
<i>lninu</i>	0.030 3 (0.042 1)	0.179 9* (0.091 2)	<i>lninu</i>	0.206 0** (0.099 8)
<i>lnfinan</i>	-0.017 0 (0.033 0)	-0.129 9** (0.062 7)	<i>lnfinan</i>	-0.266 2*** (0.063 2)
<i>lntran</i>	0.141 3*** (0.042 2)	0.122 1*** (0.028 6)	<i>lntran</i>	0.066 0*** (0.022 2)
<i>lngov</i>	-0.034 0 (0.144 6)	0.063 2 (0.077 5)	<i>lngov</i>	0.029 0 (0.047 2)
<i>lninst</i>	0.398 2*** (0.116 8)	0.200 4*** (0.055 0)	<i>lninst</i>	0.211 6*** (0.057 2)
<i>0_lninno</i>	0.072 8 (0.048 6)	0.134 1*** (0.036 6)	<i>lninno</i>	0.154 4*** (0.031 9)
<i>1_lninno</i>	0.203 2*** (0.018 1)	0.232 7*** (0.039 2)		— —
<i>0_lnl</i>	0.946 0*** (0.159 5)	0.300 7*** (0.103 0)	<i>lnl</i>	0.151 2* (0.078 0)
<i>1_lnl</i>	0.683 3*** (0.100 6)	0.191 9 (0.129 5)		— —
<i>0_lnk</i>	0.296 9*** (0.072 2)	0.490 4*** (0.043 1)	<i>lnk</i>	0.531 3*** (0.048 0)
<i>1_lnk</i>	0.382 9*** (0.061 5)	0.481 1*** (0.057 7)		— —
<i>Constant</i>	-4.131 7*** (0.826 6)	-1.234 3 (0.748 6)	<i>Constant</i>	0.090 8*** (0.754 6)
<i>Observations</i>	187	510	<i>Observations</i>	323
<i>R-squared</i>	0.985 9	0.980 0	<i>R-squared</i>	0.893 0
<i>Number of province</i>	11	30	<i>Number of province</i>	19

注:*,**,*** 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差调整后的 *t* 值(下同)。内陆地区样本不存在门槛效应,所以,本文对其予以简单 OLS 回归,其估计结果仅供参考

第三,全国样本创新驱动动力在突破门槛值之前,劳动力、资本要素驱动力弹性系数值分别为 0.300 7,0.490 4,创新驱动动力弹性系数值仅为 0.134 1,这表明以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

依赖于要素驱动力。创新驱动动力突破门槛值之后,劳动力、资本要素驱动力弹性系数值分别降至 0.191 9,0.481 1;创新驱动动力弹性系数值上升为 0.232 7,即劳动力要素驱动力由每上升

1%可以驱动经济增长 0.300 7%,转变为每上升 1%能够驱动经济增长 0.191 9%;资本要素驱动力由每上升 1%可以驱动经济增长 0.490 4%,转变为每上升 1%能够驱动经济增长 0.481 1%;创新驱动动力由原先的每上升 1%可以驱动经济增长 0.134 1%,转变为每上升 1%能够驱动经济增长 0.232 7%。在突破门槛之后,创新驱动动力虽略超劳动力要素驱动力,却仅是资本要素驱动力的约 0.5 倍,仍小于劳动力与资本要素驱动力的总和贡献水平,这表明全国样本虽存在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态势,但并没有完全实现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要素驱动力依然发挥主要作用。申萌等学者曾得出与本文一致的研究结论,指出随着资本积累,产能已相对过剩,经济却未过渡到创新驱动阶段,说明我国创新能力依然薄弱^[34]。

各地区乃至全国样本的产业结构水平、交

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水平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如投资效率低下、资金闲置等问题对经济增长造成了负向影响。内陆地区与全国样本的政府支持力度系数值为正,沿海地区政府支持力度系数值为负,且都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现阶段创新环境虽有所改善,但沿海地区作为创新引领区,其对创新环境要求较高,政府干预过多可能会抑制创新主体及其创新活动的积极性。

(二)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效应实证分析

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与全国样本的消费升级拉动力均存在已突破的单一门槛值,分别为 1.070 2,1.115 4,1.106 1,置信区间分别为 (1.058 8,1.071 4)、(1.105 7,1.116 6) 和 (1.096 9,1.109 2)(如表 3 所示)。

表 3 需求侧门槛效应检验及门槛值估计

地区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全国	
	单门槛检验	双门槛检验	单门槛检验	双门槛检验	单门槛检验	双门槛检验
F 统计量	58.560 0	8.990 0	55.430 0	16.340 0	115.160 0	16.240 0
P 值	0.016 0	0.908 0	0.012 0	0.182 0	0.000 0	0.700 0
门槛值	1.070 2	—	1.115 4	—	1.106 1	—
置信区间	(1.058 8,1.071 4)	—	(1.105 7,1.116 6)	—	(1.096 9,1.109 2)	—

门槛估计值对应的 LR 统计量在临界值 7.350 0 之下,这表明门槛估计值与门槛真实值一致(如图 4 所示)。

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乃至全国样本均已实现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消费升级成为需求侧拉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动力(如表 4 所示)。

第一,沿海地区消费升级拉动力在突破门槛值之前,以出口代表的外需拉动力弹性系数值为 0.261 6,投资需求拉动力弹性系数值为 0.462 1,消费升级拉动力弹性系数值为 -0.207 2。其中,消费升级拉动力系数值为负且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沿海地区会率先出现

居民对消费升级的需求,通过有效需求创造供给,拉动厂商引进人才、购进机器设备、扩建厂房等,以改进、研发产品和服务,但囿于初期消费升级需求总量和规模偏低,对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形成本地化规模经济,因此,为满足居民消费升级支付的显性或隐性成本超出消费升级带来的收益。消费升级拉动力在突破门槛值之后,外需拉动力弹性系数值式微上升至 0.342 1,投资需求拉动力弹性系数值降至 0.262 3,消费升级拉动力弹性系数值上升至 0.936 9,消费升级拉动力分别是外需拉动力和投资需求拉动力的约 2.7 倍、约 3.6 倍,且消费升级拉动力上升幅度远高于投资需求拉动

力下降幅度,这表明沿海地区已实现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内需拉动力在显著上升的基础上,主要由消费升级拉动该地区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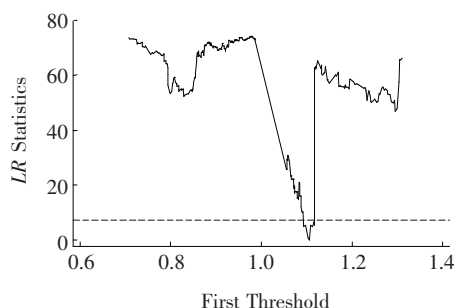


图4 30个样本省份消费升级拉动力
估计值与置信区间

第二,内陆地区消费升级拉动力在突破门槛值之前,外需、投资需求拉动力弹性系数值分别为0.083 1,0.378 8,消费升级拉动力弹性系数值为0.146 0。消费升级拉动力在突破门槛值之后,外需拉动力弹性系数值升至0.183 8,投资需求拉动力弹性系数值降至0.222 3,消费升级拉动力弹性系数值升至0.889 2。从各变量的影响效力变化上来看,消费升级拉动力与投资需求拉动力的总和贡献水平明显上升并超过外需拉动力,而且,在突破门槛之后,消费升级拉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外需拉动力、投资需求拉动力的约4.8倍、约4倍,这表明内陆地区也已实现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在内需规模扩大基础上消费升级上升为需求侧拉动该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第三,全国样本的消费升级拉动力在突破门槛值之前,外需、投资需求拉动力弹性系数值分别为0.118 0,0.443 9,消费升级拉动力弹性系数值为0.104 8。消费升级拉动力在突破门槛值之后,外需拉动力弹性系数值上升为0.198 7;投资需求拉动力弹性系数值下降至0.272 1;消费升级拉动力弹性系数值上升至0.987 2,即外需拉动力由原先的每上升1%可以拉动经济增长0.118 0%,转变为每上升1%能够拉动经济增长0.198 7%;投资需求拉

动力由原先的每上升1%可以拉动经济增长0.443 9%,转变为每上升1%能够拉动经济增长0.272 1%;消费升级拉动力由原先的每上升1%可以拉动经济增长0.104 8%,转变为每上升1%能够拉动经济增长0.987 2%。从各变量影响效力变化上来看,外需拉动力增加近1倍,投资需求拉动力下降了约3/5,消费升级拉动力增长约10倍;在突破门槛值之后,消费升级拉动力分别为外需、投资需求拉动力的约5倍、约3.6倍,这表明外需拉动力相对内需拉动力呈现疲软状态,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内需拉动力显著上升的基础上,主要依靠消费升级拉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此外,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均有利于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全国的经济增长。沿海地区和全国样本制度质量系数值为负,内陆地区制度质量系数值为正,这可能是因为沿海地区作为中高档消费引领区,该地区在内需规模扩大基础上消费升级所需的制度环境高于其他地区,但其现有的制度环境在支持该地区居民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消费升级需求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制度质量的不足不利于消费升级进一步提升,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负向影响。内陆地区大部分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在满足低档需求的基础上追求中高档消费,对制度环境的要求并不高,因此,内陆地区制度质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全国样本制度质量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沿海地区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超过内陆地区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引致全国样本的制度环境不足以支持消费升级拉动力进一步提升。沿海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系数值为负,内陆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系数值为正,这可能是因为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变迁引起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替代对特定产业部门造成冲击,容易导致经济波动,而内陆地区产业结构可能相对合理,其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相互作用后,导致全国样本产业结构水平系数为负且不显著。

表 4 需求侧各变量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全国
<i>lninu</i>	−0.218 8 [*] (0.104 9)	0.428 5 ^{**} (0.200 0)	−0.086 6 (0.117 8)
<i>lnfinan</i>	−0.063 1 (0.053 3)	0.027 8 (0.070 2)	0.052 0 (0.036 4)
<i>lntran</i>	0.047 6 (0.041 9)	0.064 2 ^{***} (0.018 4)	0.075 5 ^{***} (0.021 7)
<i>lngov</i>	0.526 8 ^{***} (0.160 4)	0.172 9 [*] (0.083 3)	0.253 5 ^{**} (0.115 1)
<i>lninst</i>	−0.362 8 ^{**} (0.152 0)	0.150 9 ^{***} (0.051 0)	−0.032 2 (0.081 5)
<i>0_lncon</i>	−0.207 2 (0.240 9)	0.146 0 (0.142 2)	0.104 8 (0.130 1)
<i>1_lncon</i>	0.936 9 ^{***} (0.280 0)	0.889 2 ^{**} (0.386 7)	0.987 2 ^{***} (0.266 5)
<i>0_lnex</i>	0.261 6 ^{***} (0.071 0)	0.083 1 ^{***} (0.021 4)	0.110 8 ^{***} (0.028 6)
<i>1_lnex</i>	0.342 1 ^{***} (0.068 6)	0.183 8 ^{**} (0.066 2)	0.198 7 ^{***} (0.034 9)
<i>0_lni</i>	0.462 1 ^{***} (0.075 2)	0.378 8 ^{***} (0.039 4)	0.443 9 ^{***} (0.062 3)
<i>1_lni</i>	0.262 3 ^{***} (0.043 7)	0.222 3 ^{**} (0.103 0)	0.272 1 ^{***} (0.075 4)
<i>Constant</i>	4.647 4 ^{***} (0.735 2)	1.397 9 (0.886 5)	3.499 0 ^{***} (0.526 9)
<i>Observations</i>	187	323	510
<i>R-squared</i>	0.969 0	0.974 9	0.964 0
<i>Number of province</i>	11	19	30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乃至全国样本的外需拉动力在突破门槛值之后有所上升，这可能是由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以出口规模衡量的外需拉动力会随之上升，而且，由外需拉动向在内需规模扩大基础上消费升级拉动转换，实质上是相对降低外需拉动力，主要依赖于在内需规模扩大基础上的消费升级拉动力，形成以内需拉动为主、外需拉动为辅的需求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内外需协调性高质量增长。另一方面，在消费升级拉动力突破门槛值之前，内陆地区和全国样本

的投资需求拉动力最高，消费升级拉动力次之，外需拉动力最低（沿海地区消费升级拉动力最低为特例），这基本符合三大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现实，可能是因为以出口代表的外需拉动力在宏观经济数据中难以验证，以及此阶段投资需求的增加主要是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的，因此，在消费升级拉动力突破门槛值之前，主要依赖外需主导以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

(三)稳健性检验

借鉴陈菁的处理方法，本文通过将全国 30 个样本省份的创新驱动力与消费升级拉动力变量均滞后一期，以检验门槛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是否会影响门槛估计值、各变量估计系数的稳健性与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35]。③

稳健性检验得到的门槛回归结果与本文估计模型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供给侧与需求侧门槛估计值个数一致，门槛估计值大小及各变量影响效力、变化程度、贡献方向甚至显著性水平与估计模型均相差无几，验证了前文门槛回归结果的稳定性，这也说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不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创新驱动与消费升级拉动力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中新动能形成的主要动力，以要素驱动力与外需拉动力作为驱动或拉动以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旧动力，分别探讨供给侧动能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及需求侧动能由外需拉动向在内需规模扩大基础上的消费升级拉动转换及它们对经济增长水平变化的作用机理，并基于 2001—2017 年我国 30 个省份面板数据，结合门槛模型分别检验供给侧与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是否完成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效应变化，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从供给侧视角来看，沿海地区及包含 30 个省份的全国样本在总体上均已经表现出显著的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态势，却未完全实现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而内陆地区仍

没有表现出新旧动能转换态势,现阶段我国各地区及全国总体经济增长仍需生产要素发挥其主要驱动作用。第二,从需求侧视角来看,各地区及全国总体上不仅表现出显著的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态势,而且均已完成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消费升级成为需求侧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此外,制度质量难以满足全国样本(尤其是沿海地区)消费升级拉动力进一步提高的需求,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第三,从供给侧与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的空间差异视角来看,沿海地区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完成情况优于内陆地区,但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完成情况并无较大差异。从新旧动能转换目标完成情况的供给侧与需求侧差异视角来看,各地区及全国总体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完成情况均明显滞后于其需求侧。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沿海地区政府应构建并扩大创新型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平台,并落实简政放权政策,激发私营企业创新活力,以改善本地区制度环境,加速实现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内陆地区要降低对传统产业的扶持力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加大对创新型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支持力度,以生活补助、住房补贴等举措改进并落实相关人才引进政策,以税收优惠或减免、财政补贴等手段吸引创新型企业在本地区投资建厂,逐步提高创新水平。此外,国家要注重整合全国创新资源,确保沿海地区科技创新成果向内陆地区流动的渠道畅通,促进区域间创新水平协同发展进而提高全国的创新水平。

第二,政府应统筹推进改革收入再分配制度,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以及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同时,要重视社会消费文化的转变,形成并传播合理适度地消费理念,避免过度消费。另外,要进一步优化全国范围的制度环境,营造追求更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氛围。

第三,政府应建立稳定的营商环境,通过稳定汇率,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培育企业家精神,确保在逆全球化冲击下提高国家或地方的企业、产业竞争力,提高创新动能。同时,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水平,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及资源,通过发挥内需潜力,加速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加大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改革力度,实现供给侧新动能与需求侧新动能协调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增长目标。

[注释]

- ① 作者根据2010—201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 ② 面板数据通过了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经过Hua sman 检验适用固定效应模型限于篇幅,文中未列示。
- ③ 限于篇幅,文中未列示门槛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参考文献]

- [1] 任保平,李禹墨.新时代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转换[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9(1):5-12.
- [2] 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4):5-18.
- [3] 陶长琪,彭永樟.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制度质量视角下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与路径选择[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7):3-21.
- [4] 王一鸣.以改革创新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N].人民日报,2014-02-27.
- [5] 杨子荣,代军勋.新常态下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有效边界[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12):19-29.
- [6] 郑江淮,宋建,张玉昌,等.中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进展评估[J].中国工业经济,2018(6):24-42.
- [7] 陈冲,吴炜聪.消费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驱动机理与实证检验[J].上海经济研究,2019(6):59-71.
- [8] 李建伟.中国经济增长四十年回顾与展望[J].管理世界,2018(10):11-23.
- [9] 裴长洪,倪江飞.习近平新旧动能转换重要论述的若干经济学分析[J].经济学动态,2020(5):3-14.
- [10] 程名望,贾晓佳,俞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1978—2015年):模型与实证[J].管理世

- 界,2018(10):161-172.
- [11] 姚毓春,范欣,张舒婷. 资源富集地区:资源禀赋与区域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2014(7):172-173.
- [12] Krugman P.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J]. Foreign Affairs,1994,7(31):62-78.
- [13]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张平,刘霞辉,等. 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J]. 经济研究,2014(12):4-17,32.
- [14] 曾毓,李元旭. 试论企业家精神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2017(10):81-94.
- [15] 赵君丽,吴建环. 发达国家“四新”经济的发展及对上海的启示[J]. 上海经济研究,2015(5):79-85.
- [16] 师博,张冰瑶. 新时代、新动能、新经济——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解析[J]. 上海经济研究,2018(5):25-33.
- [17] 蔡昉.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 中国社会科学,2013(1):56-71,206.
- [18] Eichengreen B, Park D, Shin K. Growth Slowdowns Redux[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2014(32):65-84.
- [19] 杨蕙馨,焦勇. 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判[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7):16-28.
- [20] Feder G. On Ex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3(12):59-73.
- [21] Holmes T J, Schmitz Jr J A. A Gain from Trade: From Unproductive to Productive Entrepreneurship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1,47(2):417-446.
- [22] 李福柱,王祥云. 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水平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59-68.
- [23] 洪银兴. 消费需求、消费力、消费经济和经济增长[J]. 中国经济问题,2013(1):3-8.
- [24] 江小涓. 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业增长[J]. 经济研究,2017(3):4-17.
- [25] 洪银兴. 进入新阶段后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2017(5):5-15.
- [26] Bruce E H.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9,93(2):345-368.
- [27] Hasan I, Tucci C L. The Innovation-Economic Growth Nexus: Global Evidence[J]. Research Policy,2010,39(10):1264-1276.
- [28]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1952—2000[J]. 经济研究,2004(10):35-44.
- [29]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11(5):4-16,31.
- [30] 杨有才.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金融发展门槛变量的分析[J]. 金融研究,2014(2):59-71.
- [31] 王晓东,邓丹莹,赵忠秀.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与 Feder 模型的实证检验[J]. 管理世界,2014(4):173-174.
- [32] 刘生龙,胡鞍钢. 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 1988—2007[J]. 经济研究,2010(3):4-15.
- [33] 韩其恒,李俊青,刘鹏飞. 要素重新配置型的中国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2016(1):10-28,187.
- [34] 申萌,万海远,李凯杰. 从“投资拉动”到“创新驱动”: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和转型冲击[J]. 统计研究,2019(3):17-31.
- [35] 陈菁.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分析[J]. 当代财经,2018(10):33-44.